

# 开放社会

—— 改革全球资本主义

【修订版】

OPEN SOCIETY:  
REFORMING GLOBAL CAPITALISM

〔美〕乔治·索罗斯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开 放 社 会

——改革全球资本主义

(修订版)

〔美〕乔治·索罗斯 著

王 宇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2011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修订版)/[美]索罗斯著;  
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ISBN 978-7-100-06677-8

I. 开… II. ①索…②王… III. 资本主义社会—研  
究 IV. 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441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开 放 社 会  
——改革全球资本主义  
(修订版)  
[美]乔治·索罗斯 著  
王 宇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06677-8

---

2011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5 插页 2

定价:45.00 元



#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

很高兴《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版了，这在2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

很长时期以来，我的一言一行都被许多“神话”和“谣言”包围着，相信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澄清我的所思、所为，以及我对未来的希望和建议。正如中国的一句老话所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这本书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我是这么称呼它的）提出了批评，但是，这不应该被理解为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批判。不幸的是，我的书总是被这样曲解，特别是在一些前苏联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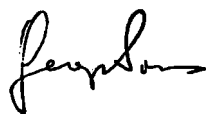
市场不可能满足所有公共需求，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市场却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需求。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我希望强调的是有管理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一开始就是打算写给中国读者的，我就会写成另外一本书，一本赞美市场经济优越性的书——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长期以来无法为中国人民所享受。由于这本书主要是写给西方读者的，所以，我着重分析了市场经济的缺点。

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人民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并怀有深深的敬意，我希望此书在中国的出版，能够对这一事业有所帮助。

## 2 致中国读者

非常感谢商务印书馆，它为我提供了一个与中国读者交流的机会。非常感谢中国人民银行的王宇博士，她认真地翻译了这本书。

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which appears to read "Soros".

乔治·索罗斯

2001 年 6 月

# 致 谢

我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发展出的理论框架终于受到了世人严肃的、批判性的关注。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在这里，我衷心感谢所有那些关注本书前一版本和这一版本的人们。

阿纳托尔·卡莱茨基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岌岌可危的开放社会》一书的责任编辑，他帮我整理资料，使其更容易理解；在理论框架方面，罗曼·弗里德曼给予了我特别的帮助；利昂·博茨坦恩提出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看法，为此我们进行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安东尼·吉登斯对手稿提出过不少意见；威廉·牛顿—史密斯帮我修正了一些哲学观点；约翰·格雷建议我重读了卡尔·波拉尼的《巨变》（*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帮助我的人还有：罗伯特·库特尼尔、约翰·西蒙、杰弗里·弗里德曼、马克·马洛克·布朗、阿米尼奥·弗拉加、托姆·格莱斯尼尔、阿里希·奈特、丹尼尔·卡内曼、布朗·威恩和里查德·迈德雷。

在这一版的准备过程中，我得到了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亚当·普森先生的热情帮助，虽然他对我书中的观点不负有任何责任。叶胡达·埃尔卡纳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我收到了许多信件，来信给予指教的人包括：劳伦德·阿姆布鲁

斯一雷卡托斯、法布里吉奥·克里西里、约翰·格雷、加诺斯·吉斯、马利亚·科瓦克斯、佩特·罗姆和埃斯特万·李。卡蒂·嘉米逊以她一贯的简洁风格记录了读书会的讨论情况。莱斯·吉尔勃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里组织了一次讨论会，我从中深受教益，参加这次讨论的有：埃里泽贝斯·克拉吉里、莫里斯·古尔登斯坦、南希·古德曼、罗吉尔·库巴里克、劳伦斯·科布、米切尔·曼德鲍姆、威廉·鲁尔斯、沃尔特·米德、皮特·奥斯诺斯、大卫·菲利普斯、亚当·普森、吉登·罗斯、杰弗·山德勒、迪米特里·斯密斯、本·斯特尔和法利德·扎卡利亚。莫特·阿布拉莫威特、马蒂·阿第萨利、安东尼·莱斯特、查里斯·W. 梅恩斯、阿里·奈尔、斯蒂瓦特·帕博金、阿莱克斯·隆多斯、科内利奥·梭马鲁格和约赛弗·斯蒂格利茨参加了我在家里举行的周末讨论会。劳德·莱斯特就我关于开放社会的定义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但我没有能够给出一个令他满意的答复。我要向所有那些阅读过本书手稿并提出问题的人致谢。值得我感谢的人实在太多，我要特别感谢本杰明·巴伯尔、利昂·博茨坦恩、罗曼·弗莱德曼、埃卡特利纳·杰尼瓦、阿纳托尔·卡莱茨基、阿莱克斯·鲁配斯、阿里·奈尔、约赛弗·奈、安德利·史雷弗、约翰·西蒙和 F. 范泽尔斯拉伯特，他们给我提供了书面意见。加斯丁·雷特斯在最后一刻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我对皮特·奥斯纳斯与公共事务出版社的工作效率非常满意，也十分感激科里斯·达赫尔的引见。

冯妮·希尔不厌其烦、不计其数地打印手稿，核实参考文献，实际上她是这一项目的总经理，没有她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该书的出版工作的。



# 导 言

这是一本实践的哲学著作：它提供了一个可作为行为指导原则<sup>ix</sup>的理论框架。我本人的投资活动和慈善活动都一直受到这一框架的指导。我坚信，它也能广泛应用于整个社会：为全球开放社会提供原则。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宣言，为了让它得到证明，我不得不探索很多领域，涉足许多层面：理论的与实际的，公共的与私人的。

在实践的层面上，我已经建立了一个基金会的网络<sup>①</sup>，用以促进开放社会的发展进程。该基金网不仅覆盖了前苏联帝国的所有国家，而且其触角还延伸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南非、南部非洲的 10 个国家、西亚的 16 个国家、海地、危地马拉、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在美国，还设有开放社会协会。每一个国家的基金会都有自己的董事会和工作人员，由他们决定工作重点并负责自己国家基金会的相关行动。他们赞助各项公众活动，也努力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合作，因为一个民主的和有效率的政府是开放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惜，各国基金会的活动常常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

① 索罗斯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索罗斯基金会，也叫开放社会基金会。——译者

在有些国家,尤其是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基金会在发动民间社会、反对强权政府方面就做得很成功;而在白俄罗斯和缅甸,基金会<sup>x</sup>会被禁止,我们只能从外部做工作。在塞尔维亚,基金会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中运作。另外,在那些基金会比较活跃的地区,我们成功地推广了不少项目,包括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青少年问题、法律制定、司法制度和法律执行,也包括监狱、艺术和文化机构、图书馆、出版社和互联网、媒体、弱势群体(比如智力不健全的人)、少数民族(尤其是吉普赛人)、公共卫生、吸毒等。

我被人们广泛但有些夸张地称为金融界的宗师(financial guru)。但是,我关于政治和安全的观点却很少被人们认识。实际上,我仅仅是一个平凡的金融实践家,但我果断、有序的防范危机的能力无人可及。

在本书中,我主张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应该在这样两个目标下联合起来:第一,促进各个国家内部发展开放社会;第二,强化国际法律与组织,以建立全球开放社会。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商品和劳务的自由贸易、尤其是资本自由流动为标志的全球经济中。因此,各个国家的利率、汇率和股票价格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国际金融市场的每一变化对每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都会产生重大影响。金融资本享有优越的地位,因为资本较其他生产要素更具流动性,而金融资本又比其他形式的资本更具有流动性。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金融市场的全球化降低了各个国家对资本征税和资本管制的能力,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单个国家的经济命运,因此,可以说,存在着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sup>xi</sup> 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我

们还不能说民主也取得了同样的胜利。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着政治与经济的严重失衡。我们有一个全球经济，而政治安排却牢固地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全球社会的需要如何与国家主权及国家利益协调一致？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资本主义与民主化进程并非同步，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产阶级的形成会产生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和要求，也有利于政治稳定。但是，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并非自动产生。专制政府不会自愿放松对权力的控制，而且他们还常常得到国内外利益集团的唆使和资助。我们可以在很多国家看到这种现象，尤其是在关系到石油和钻石之类的自然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在当今世界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不法联盟也许是对自由和民主的最大威胁。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过去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法西斯主义，它指的是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和萨拉查时代的葡萄牙。今天，虽然它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但是，在滕森统治下的秘鲁、在穆加贝统治下的津巴布韦、在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SPDC)统治下的缅甸与马哈蒂尔统治下的马来西亚，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它们的影子。更令人不安的是，共产主义的瓦解也促使许多大企业与政府勾结，包括俄罗斯政府在内。民主进程仍然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政府权力的受害者。更令人忧虑的是，民主国家普遍忽视了其他国家的政治现状：集体利益至上。然而，处于强权政治压制下的人民急需外援，这常常是他们的唯一的生存希望。

在创造财富方面，资本主义是十分成功的，但是，资本主义并 xii

未对自由、民主和法治提供保障。商业活动是由利润驱动的，而不是为保障普适性原则<sup>①</sup>而设计的。虽然绝大多数商人都是正直的公民，但这并不能改变商业活动的动机是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的事实。经理们首先要对企业的所有者负责，而不是对所谓公共利益这种含糊不清的实体负责——虽然许多企业试图或佯装致力于公共利益。如果我们真正关心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普适性原则，那么，我们就不能将其交给市场来主宰，我们必须建立其他机构来保护它们。

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它们，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市场将会满足我们的所有需要。有一种观点认为，让每一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就会因此而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在19世纪，这种观点被称为“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但是，我给它找到了一个更恰当的名称：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sup>②</sup>。这是一种颇具诱惑力的观点，但它只说对了一半。就对私人利益的追求而言，市场是最恰当不过的形式，但是，市场却没有为了公共利益而设计。保护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对公共利益的一种维护。市场参与者之间彼此竞争的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竞争，而是为了战胜对手、赢得竞争。如果他们有能力，他们将取消竞争。

维护公共利益向来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由于全球资本市场的扩张，国家的权力逐渐萎缩了。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

① 普适性原则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价值判断，比如自由竞争、等价交换等。——译者

② 原教旨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基督教新教一些自称“保守”的神学家为反对现代主义，尤其是圣经评判学而形成的一种神学主张。——译者

对其课税和管制行为只能造成赶走资金的后果。因为资本是财富创造的必要条件,政府必须想办法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要,甚至常常因此而牺牲其他考量。驱逐资本比对资本课税和管制带来的危害更大。最近,德国财政部长奥斯卡·拉封丹(Oscar Lafontaine)试图提高企业税赋而遭受的失败就很能说明问题。<sup>xiii</sup>

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一个良性的发展。在创造财富方面,私人企业比政府更能干,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竞争导致了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政府通常会滥用权力,但全球化提供了个人自由,这是任何政府都不能够提供的。

但是,这种发展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即政府按照本国人民的意志行使其职能的能力已减弱。假如自由市场真的能够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要,也就无须为此担心,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许多公众的需要显而易见——和平与安全、法律和秩序、人权、环境和社会正义等。市场价值只表明了市场参与者在自由交易中愿意付出多少,而不能说明他们的公共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因此,社会价值只能由社会和政治安排来保证,尽管它们不如市场那么有效率。

甚至是在个人利益的满足方面,市场机制也存在缺陷和不完备之处,而这些被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忽视。例如,金融市场存在着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完全竞争理论把需求和供给看作各自独立,当两条曲线相交时,均衡就实现了。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均衡概念所赖以存在的假设条件却很少得到满足。在金融市场中这些假设条件更不可能实现。金融市场的投资者试图把未来“贴现”,而未来又反过来依赖于现在它如何被贴现。由于参与者的理解不完备,结果存在着内在的不确定性。因此,金融市场必须要由公共

xiv 政策来保证,这一点正与自我均衡的理论相反。

不幸的是,公共政策本身也是不完美的,由此在金融市场的历史上,时常会出现各种经济危机。但不管怎样,在试验和犯错误的过程中,发达工业化国家已经建立了有效的中央银行制度和完善的管制架构,成功地把不稳定限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最近一次金融市场严重危机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今天处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国家的金融基础仍然很糟糕:1997—1999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一些新兴市场地区所造成的破坏不亚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给美国经济造成的破坏。

今天,国际金融体系的管理已经不能再以国家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1945 年,许多国际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诞生了,但它们是专门为一个没有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而设计的。虽然近年来这些机构也在努力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但它们还是跟不上国际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步伐。它们没能阻止 1997—1999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和蔓延。幸运的是,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国家没有受到影响(事实上,这些国家还因为边缘国家的危机而受益了),世界经济的复苏的建设也高于预期。这种惊人的复苏能力,使人们更加相信金融市场具有强大的自我修正能力。这次危机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力和影响被削弱了。如果危机再度发生,世界经济将会因此而遭受更大的冲击。那种认为我们不会再经历危机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目前,国际政治架构的缺陷大于国际金融架构的缺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催生了联合国,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不幸的是,联合国的不当设计使它永远不能实现这一崇

高目标和使命。联合国成立不久,世界就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由<sup>xv</sup>美国领导,另一个由苏联领导。双方在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然而,双方也都意识到了必须尊重对方的利益,因为每一方都拥有摧毁对方的核武器。正是这一点把冷战转变成了一种世界稳定的工具,这种稳定是建立在双方都确保摧毁对方的能力(MAD,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基础上。

这种双方都确保摧毁对方的均衡状态因苏联帝国的解体而告終了。联合国按照当初的设想发挥作用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但是,西方民主国家因未能就如何处理波斯尼亚危机达成共识而失去了机会。世界局势变得动荡不定。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治架构并不能保证和平与稳定。因为主权国家常常滥用权力,它们权力的削弱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情。就此而言,市场上出现的反对国家主权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国家主权的弱化应以国际组织力量的壮大为前提。这也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它既反对政府权力,也反对国际权威。

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并不是唯一的谬误,民族主义也是错误的观念。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更重视国家主权。作为世界仅存的超级军事强国,它愿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一方面能够推动国际市场开放,另一方面又能保护投资利益,不过,美国极力反对其他国家侵犯美国主权。它可以出面干涉别国内政,却从不愿意遵守自己试图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准则。

美国把自己看作是高尚原则的捍卫者,其他国家只看到强权<sup>xvi</sup>和傲慢。我认为,美国现在的单边主义姿态已经严重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这真令人感到震惊。然而,只要美国从单边主义立

场转向多边主义立场,它也很容易变成一种强大而有益的力量。这个世界需要某些行为准则和标准,假如美国准备接受这些准则和标准,它就可以在建立这些准则和标准的过程中起到领导作用。

不幸的是,美国讨厌多边主义原则并非没有道理,大多数国际机构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它们是由国家组成的机构,与国家关系密切,正如黎塞留红衣主教所说,国家没有原则,只有利益。这足以解释国际组织的行为和运行原理。一个国家机器的任何弊病都会在国际组织的官僚机构中被重复和放大。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并不适于维护普适性准则。联合国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不良记录就是证明。

我认为,只有借助于公民社会,国际机构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也许国家真的没有任何原则可言,但民主国家要尊重其公民的意愿。如果公民是有原则的,他们就会要求他们的政府遵从这些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力倡导民主国家联盟的原因:它可以使公民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确保其政府遵守联盟的原则。不过,这也是最困难的事情。正如最近发生在西雅图和华盛顿的游行示威所表明的那样,公民社会也可以被调动起来反对国际组织,我们必须找到适当的方法,调动公民社会支持国际组织。

联盟有两个目标:第一,强化国际法和国际机构;第二,促进每个国家内部的民主进程。这两个目标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促进民主进程必须由国际组织来实施。我们不能把普适性原则的维护托付给任何一个国家,因为每当普适性原则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很可能会占上风。当初,美国的开国领袖们在设计美国宪法时就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然而,在全球范围推进民主进程的原动力是各民主国家的自



身利益。在当今相互依存的全球社会中,大多数冲突不是发生在 xvii  
国与国之间,而是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民主国家不能容忍一  
国政府违反人权的行为,这种事情会演变成像南斯拉夫内战那样  
的冲突,它们介入冲突只是迟早的事情。即使民主国家不介入,它  
们也可能面临大量难民流入等后果。

由外力推动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会遇到某些两难之处:只有  
当外部干预能给该国带来好处,才能被自愿接受;否则抵触行动无  
法避免。因此,外部干预应尽可能采取建设性的形式。

冲突一旦发生,会很难处理。因此,防范危机越早越好。但是  
在早期阶段,又难发现危机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坚持,防  
范危机的最好方法,就是推进开放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我的开  
放社会基金会网络所要做的事情。通过建立开放社会,可以大大  
减少外部干预的概率,即使惩罚性干预不可避免,由于前期的建设  
性措施,也会使它能够较为顺利地实施。

目前,我们过于依赖惩罚性措施。民主国家之间唯一有效的  
联盟是一个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我们还需  
要一个政治联盟来补充这一军事联盟。由于开放社会与经济繁荣  
联系密切,该联盟必须能够提供经济资助。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介入科索沃冲突之后,这些想法尤其有 xviii  
意义。我认为,那次干预是必要的,但其出发点必须是为了这个地  
区更美好的未来。只有当欧盟使该地区的国家因亲近欧盟而变得  
相互亲近时,上述目标才能实现。这一想法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并  
在《东南欧稳定公约》(*Stability Pact for Southeastern Europe*)中  
得到体现。如何使这一想法得以实现是欧盟的首要任务,也是我  
的首要任务。